

晋侯大墓兔尊小议

□ 李玉芬

山西省发现的西周时期的青铜器,多数与晋文化联系较为紧密。

1979年以来,考古工作者陆续在曲沃县曲村—翼城天马对晋国遗址进行发掘,“这是一处以晋文化为主的大型周代遗址”^[1];发现了不少西周墓,出土了许多青铜器。对晋侯墓地较大规模的发掘自1992年开始,共进行了五次。憨态可掬的国宝级文物兔尊,是1992~1993年在天马一曲村遗址北赵对晋侯墓地进行第二次发掘时发现的,出土于晋侯墓地8号墓。“需要注意的是M8出土的3件兔形尊,这在鸟兽尊中是第一次出现”^[2]。

晋侯墓兔尊为西周晚期后段时(公元前11世纪至前771年)铸成,是盛酒器。该兔尊上的纹路清晰多样,都是器腹两侧各有同心圆纹饰三周,自内向外依次饰火纹、四目相间的雷纹和勾连雷纹。它们形体匀称平稳,体态丰满,敦实而厚重,其风格趋向典雅精致。这些兔尊的形象十分生动,如兔的耳向后,双目前视,四腿蜷曲,孕育着某种动态。再仔细观察其不同之处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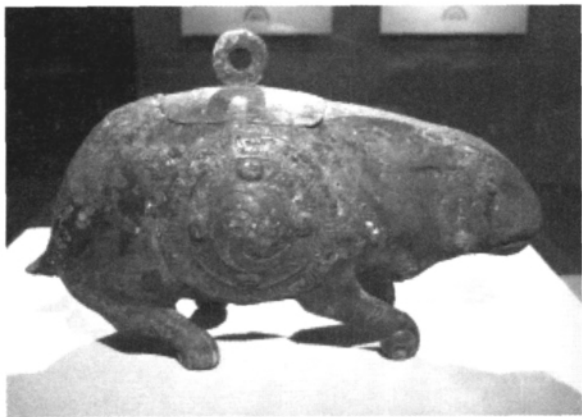
如图一和图二兔尊两件,形制、纹饰均相同,

唯一大一小。其中一个口长10.6厘米、全长20.4厘米、通高13.5厘米。兔作爬行状,前肢点地,后腿弯曲,犹如跳跃前之一瞬间。兔腹中空,背上开有圆角长方形尊口;并覆以与兔身浑然一体的盖,盖上有环形钮。“盖内粘有树叶状物,性质尚待检验。”^[4]该兔尊“前后足中线及脊背上可见范痕,似由1块底范,2块身范构成。”^[5]这是其铸造方法的体现。该兔尊“通体墨绿泛黄,表面有绿锈,磨损程度皆轻,器盖周缘棱角分明。”^[6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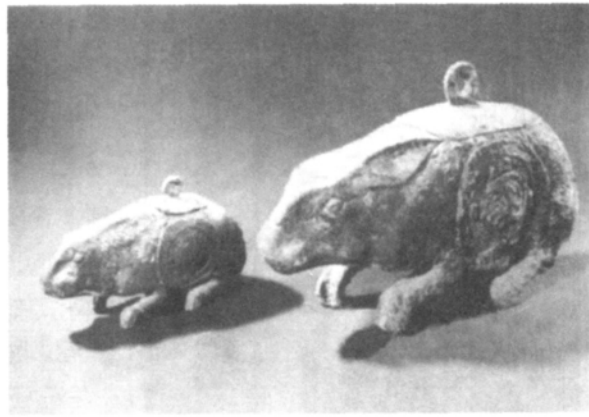
有资料显示,“在兔尊的鼻侧唇上,饰一圆圈,内勾双线‘十’字形的符号,线条工整匀称,图案十分清晰。经笔者对它在器物上所在部位的仔细观察,其图案不像是为铸工们所饰的抽象兔嘴,而是有意识铸饰的图案符号”^[7](图三)。

图四青铜兔尊口径18.4厘米,通高22.2厘米,全长31.8厘米。兔静卧,腹中空,上接喇叭形敞口长颈尊,尊口粗硕,逼真地表现了兔子负重形象。其腹部与尊口相通,足下有矮长方形圈足。器表的斑驳锈色,绿褐相间,更见岁月沧桑。

兔尊的出现是实属罕见。我们知道:“尊有共名,有专名。金文中的尊字写作‘𩚑’,象两手奉尊



图一 晋侯墓出土的兔尊



图二 晋侯墓出土的兔尊



图三 兔尊线稿



图四 晋侯墓出土的兔尊

形。铜器铭文常将‘尊’、‘彝’二字连用,这时尊是礼器的共名。到了宋朝,才把一种盛酒器称作尊。”^[9]尊的形制最常见的有圆形、侈口、圈足的,也有侈口方形,鸟兽尊为其特殊形式。

在青铜器兔尊所体现的纹样组织方式即规律或原则是:

1. 兔身腹部两侧有对称的“火纹”。

火纹(图五)是青铜器上装饰纹样之一。在圆形微凸的曲面上,沿边有数条旋转状的弧线,其中心为或大或小的圆圈,旧称“圆涡纹”。近年来有的学者根据《周礼·考工记》“火以圜”的记载,认为这种圆涡纹与金文中明字所从的“囙”字结构完全相同,故也称“囙纹”。即明是光的意思,而光必原于火,故这种纹饰可称为“火纹”。

火纹是太阳的标志。古人认为太阳即火,把火看成大自然力量的象征并加以崇拜。火纹延边有三至八道旋转状弧线,以示火焰的流动与燃烧。早期的火纹形式简单,但较为普通,以单位为主体。中晚期到战国时期,火纹的装饰变得华丽许多,并与其他纹样如龙纹、目纹、雷纹等装饰配合使用,火焰的形象更加明显。火纹通常用于簋、



图五 火纹

爵、斚、壶、卣等之上。兔尊上的图案还有勾连雷纹,即作T形的雷纹,纵线段下端亦卷成方螺旋形,同时又作为另一T形雷纹横线段内圈的一端,上下左右互相勾连。

“马今洪认为晋侯墓地所出土的鸟尊、猪尊、兔尊在形制方面既有鸟兽形尊的共性,又有独特的创新,在西周晚期晚段,兔尊替代了尊的功能,形成新的酒器组合,而猪尊、兔尊的火纹显示了晋侯墓地青铜器的独特性,晋侯墓地尊在使用年限上的大大延迟,可能是晋侯墓地青铜器的一个特点。”^[10]

2. 纹样与器形完美统一的造型。

西周青铜器设计上,注重器物使用部位的造型特点,使纹样与造型相协调和融合,增加了器物的美感;并且大部分器物的中心下移,视觉效果更为稳固。

兔尊的造型让我们看到:西周青铜器不仅担负着礼器的使命,而且也向着简单和实用化的方向发展。兔尊有盖和喇叭形敞口正是体现周人高超精妙的设计理念。如果没有兔尊腹部的空就不会有其使用价值,这说明了兔尊的实用性和装饰性。在这里也展示了虚与实的对比关系,正是它不断激励人们拥有新的创意,才使我们看到稀有的兔尊。

3. 关于兔尊纹饰的艺术特征可以从工艺手段、艺术形象设计和线条的变化三方面考察:

(1) 兔尊的腹部由内向外是火纹,四目相间的雷纹和勾连雷纹,可以看到西周后期时人们抽象思维得到进一步的提高,纹饰构图取得生动活泼的效果。

火纹在兔腹处,是雕塑技法的运用。它体现出一种浑厚、凝重的立体效果,深沉凸现出的铸

造刻饰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兔子的形象。

从兔尊的纹饰可以看到,它没有殷商时的威严规整,显得简化和富有图案趣味性。

(2) 艺术形象设计有其独到之处,主要表现在:抓住兔子最显著的特征,“以整体写实的手段造型,在现所知西周铜器中尚未见到过”^[1]。使西周青铜器神秘色彩淡化,从而加强造型的写实性,以本真的形象出现。

(3) 其纹样线条粗细不同,疏密有别,在统一中求变化。

兔尊的火纹以平面展示的手法表现出立体的特征,从而使不同份量感的粗细线条体现了画面元素的前后虚实关系。

西周青铜器总体风格雄浑、庄严、稳重,向着理性化的方向发展。其神秘色彩开始淡化,纹样趋向抒情、追求形式美,呈现出朴实自然的新风格。在晋侯大墓青铜兔尊中便显现出这种革新、解放的新风格,也体现了当时社会的进步。

晋侯大墓青铜兔尊是目前出土的青铜器中的稀罕物,也是晋国青铜文化的代表作。它不仅体现西周青铜器工艺美术划时代的进步,而且精

神内涵也得到丰富。晋侯大墓青铜兔尊的出现,使这一时期的工艺美术具有一种崇高的美学魅力和很高的科学价值。

[1] 文物编辑委员会《文物考古工作十年》,文物出版社,1991年1月第1版,第42页。

[2] 杜迺松《古代青铜器》,文物出版社,2005年6月第1版,第65页。

[3]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、山西考古研究所《天马—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》中图二七,《文物》1994年第1期,第21页。

[4][5][6] 同[3],第18页。

[7] 王克林《晋文化与北方青铜器文化关系探索》,《文物季刊》1995年第4期,第54~55页。

[8] 同[3],图二八,21页。

[9] 杜迺松《中国古代青铜器简说》,书目文献出版社,1984年5月第1版,第78页。

[10] 谢尧亨《晋侯墓地研究述评》(下),《文物世界》2009年第4期,第22页。

[11] 朱凤瀚《古代中国青铜器》,南开大学出版社,1995年6月版,第803页。

(作者系山西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)

(上接23页)

元年的“纪人伐夷”有关。可能为盟誓祭祀受降之礼器。

[1] 资料现存烟台市博物馆。

[2][19] 严文明《胶东原始文化初论》,《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》,齐鲁书社,1986年。

[3] 李步青等《盂名义初释及其有关历史问题》,《东岳论丛》1984年第1期。

[4][7] 李步青《山东莱阳县出土己国铜器》,《文物》1983年第12期。

[5] 容庚等《殷周青铜器通论》,科学出版社,1985年10月。

[6] 陈佩芬《上海博物馆新收集的西周青铜器》,《文物》1981年第9期。

[8] 山东省烟台地区文管会《烟台市上夼村出土己国铜器》,《考古》1983年第4期。

[9] 寿光县博物馆《山东寿光县新发现一批纪国铜器》,《文物》1985年第3期。

[10][12][13] 王献唐《山东古国考·黄县器》,齐鲁书社,1983年。

[11] 孙敬明《考古发现与史寻踪》,《东夷古国史研究论文集》,三秦出版社,1988年。

[14][18] 王锡平《胶东半岛夏商周时期的夷人文化》,《北方文物》1987年第2期。

[15]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山东队等《山东牟平照格庄遗址》,《考古学报》1986年第4期。

[16]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《山东潍坊姚官庄遗址发掘报告》,《文物资料丛刊》五,文物出版社,1981年。

[17] 笔者在参观该地器物标本时曾见到一些典型陶片。

[20] 1985年黄县徐村出土西周铜器,资料现藏龙口博物馆,简报待刊。

[21] 宋成钧等《胶东史前文化与莱夷历史贡献》,《东岳论丛》1984年第1期。

(作者工作单位:山东省烟台市博物馆)